

L A I X I A O E R Y U M E I G U O D U I R I Z H E N G C E



# 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政策

——战后日本历史观中的美国因素



本书由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归泳涛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政策：战后日本历史观中的美国因素 / 归泳涛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66-9500-9

I.赖… II.归… III.日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D8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7153 号

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政策

——战后日本历史观中的美国因素

LAIXIAOER YU MEIGUO DUI RI ZHENGCE

——ZHANHOU RIBEN LISHIGUAN ZHONG DE MEIGUO YINSU

归泳涛 著

---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杨亚平

责任校对：廖应碧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杨·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2.5 字数：186千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978-7-5366-9500-9

定价：24.8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LAIXIAOER  
YU MEIGUO DUIRI ZHENGCE

---

摘 要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东亚研究的开端	16
一、传教士的家学渊源	16
二、踏入东亚研究的处女地	20
三、当日本成为敌人	24
第二章 日本现代化论的兴起	30
一、日本：意识形态的战场	30
二、需要一项亚洲政策	41
三、现代化论引入日本	47
第三章 出任驻日大使	59
一、安保斗争与“中断的对话”	59
二、肯尼迪政府的新大使	65
三、蓄势待发	72
第四章 恢复“中断的对话”	78
一、构筑“对话”的舞台	78
二、与反对党及工会的接触	88
三、与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对话	95
四、罗伯特·肯尼迪访日	102

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政策  
——战后日本历史观中的美国因素

五、“对话”引起的反响	107
第五章 现代化论争	110
一、“赖肖尔攻势”	110
二、日本人的反应：近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	116
三、现代化论的力量	124
第六章 “对话”外交的困境	127
一、对越战的辩解	127
二、和舆论的纠葛	132
三、走入穷途的越战观	139
四、“对话”的限度	144
第七章 现代化论的边缘化	149
一、对越战的反思	150
二、“尼克松冲击”和“赖肖尔神话”	156
三、现代化论争的余波	163
结    论	173
赖肖尔年谱	181
参考文献	185
后    记	194

# 摘要

LAIXIAOER  
YU MEIGUO DUIRI ZHENGCE

本书选取战后美国日本学的奠基人之一、前美国驻日大使埃德温·奥·赖肖尔作为研究对象,围绕他的职业生涯和思想历程,再现美国与东亚关系史中的一段重要时期。

本书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利用《赖肖尔文件》中的原始记录,结合当时日本和美国的报刊杂志资料,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构成本书脉络的是三条相互关联的线索,一是美国对东亚政策的演变;二是赖肖尔本人的学者生涯和外交官生涯;三是从赖肖尔的思想中反映出的美国对日本乃至东亚的基本看法。作者的意图是,通过对这三条线索的交错叙述,把政治史、人物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从中揭示美国对东亚政策的一种思想源流。

本书作者认为,赖肖尔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外交家。作为学者,他是战后美国日本研究中最重要理论范式——日本现代化论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也是将这一理论运用于美国东亚政策的关键人物;作为外交家,他秉承理想主义的传统,以传教士般的精神在战后美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刻出任驻日大使,开创了美日之间“对话”外交的先河。

日本现代化论是联结赖肖尔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关节点。这一理论把日本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样板,既体现了美国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东亚的意图,也为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武器。赖肖尔在出任驻日大使期间竭力宣扬这一理论,挑起了一场与日本知识分子之间的“现代化论争”。他虽然不能通过这场论争立即改变日本的思想潮流,但在论争中,和他结成同盟的现实主义舆论精英却从此崛起,逐渐占据了日

本社会思潮的主流。赖肖尔的历史作用在于,他的现代化论为主张重新审视日本近代历史,重新界定日本国际地位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视角、一种方法。

同时,赖肖尔为了弥合“安保斗争”给美日关系造成的裂痕,展开了与日本反对党、工会、知识分子以及学生的交流,在美国和日本的反对派之间营造出一种“对话”而非“对抗”的气氛,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了日本国民中的反美情绪。这可以被看成美国外交中“软力量”的一次充分运用。

当然,在美国外交中,“软力量”和“硬力量”常常并行不悖,这使赖肖尔的“对话”外交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而陷入困境。他主张的日本现代化论也在越战的冲击下逐渐从历史舞台的中心淡出。

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搜集和整理尚未被使用过的第一手资料,对赖肖尔这个人物和他生活的时代作全面系统的分析,以填补美日关系史上的一段空白;同时,突破传统外交史研究的局限,将对赖肖尔外交的研究从政策层面深入到思想层面,以求开辟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的新视野。



## 绪 论

19世纪中叶,古老的东亚社会在西方文明的撞击下开启了近代历史。自那以来,东亚就被卷入到“西方化”、“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潮流中。这股潮流源于欧洲,兴于美国,到今天已经发展成风靡世界的“全球化”浪潮。如何认识和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是一百多年来萦绕在中国人脑海里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还将伴随今后好几代人,因为对它的解答将影响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我们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其终极的意义也在于此<sup>①</sup>。

美国与东亚的关系,有其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外壳,更有其思想的内核。本书的思路,是尽量透过物质的外壳深入到精神的内核,去探寻美国对东亚政策的思想脉络。为了寻找思想和现实之间的连接点,本书选取美国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奥·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1910—1990)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试图以这个人物的职业生涯和思想历程为线索,再现美国与东亚关系中的一段“精神的历史”。

赖肖尔不仅是二战后美国东亚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而且还在1961—

---

<sup>①</sup> 参见袁明:《“全球化”中的文化自觉》,《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3期,第24~29页。

1966 年间出任美国驻日大使。他创立并倡导的日本现代化论<sup>①</sup>,既为美国人理解日本提供了一把钥匙,也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东亚政策的一种理论武器;而出任驻日大使又使他得以把自己的思想运用到外交实践中。因此,赖肖尔的学术、外交生涯以及他的思想,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息息相关,这使他成为我们深入理解美国与东亚关系的一个良好案例。

作为一名学者,赖肖尔早已为国际学术界熟知。他关于日本史的著作,至今仍是英语国家中日本研究领域的入门教材。他的《日本人》一书及其修订版也已被译成中文。但是,不论在美国、日本还是在中国,对赖肖尔的研究都很少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赖肖尔作为一个理解和同情日本的美国学者,受命于美日关系的危难之际,亲善大使的形象非常突出,这反而掩盖了其外交的实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赖肖尔的外交以意识形态攻势为特征,涉及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内部价值观的传播和渗透,这对美国人和日本人来说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鲜有人触及。而对中国人来说,赖肖尔的日本现代化论在当时是作为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出现的,因此只是从政治上加以批判,没有从学术上展开讨论。

然而,在冷战结束十多年后的今天,昔日的敌我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比起冷战中的人们,我们也许可以用一种更加客观的学术态度来看待冷战的历史。这也是“新冷战史研究”(New Cold War History)在国际学术界方兴未艾的一个原因。而“新冷战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对意识形态在冷战中作用的重新认识<sup>②</sup>。正像著名冷战史学者加迪斯(John Gaddis)主张的那样,新的冷战史应该严肃地对待观念或者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发

---

① 国内学术界对日语中的“近代化”一词尚没有统一的翻译,既有译成“近代化”的,也有译成“现代化”的。由于该词的含义和英语中的“modernization”一词基本一致,所以本书遵循汉语中对“modernization”一词的翻译习惯,采用“现代化”的译法,只是在翻译“近代主义”一词时,将其视为一个专门术语,沿用日语中的写法。此外,日本学术界在对日本历史进行分期时,一般把从明治维新到 1945 年的这段时期划为日本的近代,而把战后的时期划为日本的现代。本书沿用了这一分期法。关于“现代化”和“近代化”提法的辨析,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 页。

② 关于国际冷战史研究的新趋势,参见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3~22 页。



挥的作用<sup>①</sup>。在加迪斯主编的“新冷战史”丛书中,有一本题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的专著,揭示了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如何塑造了肯尼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的<sup>②</sup>。本书在探讨现代化理论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时,主要借鉴了这本书的研究成果。另一位冷战史专家韦斯塔德(Odd Westad)也把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冷战史研究中三个有前途的研究范式之一,他甚至认为,冷战可以被看做是一项美国的意识形态工程。在谈到战后美国与日本及其他盟国的关系时,韦斯塔德这样写道:“美国的势力在政策、社会阶层和经济基础方面引起的变化逐渐创造了这样一些同盟体系,它们建立在相似的世界观基础上,并能够经历利益的冲突而维持下来。”<sup>③</sup>实际上,如果我们查阅最近几年来《外交史》杂志的论文和书评的话,就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和文化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中的一大主题<sup>④</sup>。

基于上述理由,本书以日本现代化论为视角,追溯赖肖尔的思想 and 职业生涯,试图以此探寻美国对日本乃至东亚政策的一种思想源流,同时也希望如实地再现一段尚未被人们叙述过的冷战历史。

美国学术界对赖肖尔的评价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来自赖肖尔过去的学生和部下,他们基本上继承了赖肖尔的学术思想,对赖肖尔的外交也推崇备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sup>⑤</sup>。他曾经写过两篇关于赖肖尔的人物评论,一是为《赖肖尔大使日记》一书所作

---

① 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② [美]雷迅马著、牛可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Odd A. Westad,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ree (Possible) Paradigm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Oct. 2000, pp. 551 ~ 565.

④ 参见 *Diplomatic History*, 2000 年以来各期的论文和书评。

⑤ 入江昭 1934 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53 年赴美国留学,1957 年成为哈佛大学历史系美国远东政策研究委员会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之一,师从费正清、赖肖尔等东亚问题专家,1961 年获博士学位。他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78 年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主席,1988 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是美国外交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国际关系史,成果卓著,并倡导用文化国际主义建构国际秩序。参见王立新:《一个文化国际主义者的学术追求和现实关怀:入江昭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代译序),[日]入江昭著、李静阁等译:《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 ~ 40 页。

的编者后记<sup>①</sup>，一是为《美国国家传记辞典》撰写的赖肖尔这一词条<sup>②</sup>。在这两篇文章中，入江昭对赖肖尔的一生作了概观，并介绍了他的学术理论和外交思想。在入江昭看来，赖肖尔倡导的日本现代化论为美日关系提供了一种思想基础，他的“对话”外交的理想，在今天仍然不失其生命力，而他作为教育家的功绩，也一定会泽被后世。入江昭的见解虽然精辟，但并非学术研究，他对赖肖尔的评价也不能说完全客观。和赖肖尔一样，入江昭深信知识和思想的交流对促进国际理解与世界和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美日关系充满希望，但他对赖肖尔的学术和外交思想诞生的时代背景——冷战，则分析不多，因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文化交流与权力政治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赖肖尔的学术和外交生涯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可分割，这是我们研究这个人物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位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曾在赖肖尔任大使期间担任大使馆新闻参事的塞耶(Nathaniel Thayer)教授，也在一本纪念美日安保 50 周年的文集中回顾了赖肖尔的大使任期<sup>③</sup>。他对赖肖尔敬仰有加，认为赖肖尔出任驻日大使是适逢其时。塞耶的记述为我们了解赖肖尔作为外交官的实际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毕竟只是简单的个人回忆，缺乏深入的分析。

美国学术界对赖肖尔及其思想的另一类评价则基本上是负面的。随着越战的升级，日本现代化论遭到新一代年轻学者的猛烈抨击，在他们眼中，赖肖尔成了为美国的东亚政策提供理论辩护的“帝国主义”帮凶。尽管这种激进的观点后来没有成为美国东亚研究的主流，但越战毕竟使现代化论风光难再<sup>④</sup>。不仅如此，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后殖民理论让现代化论更

---

① [日]入江昭：《歴史的任務を果たしたライシャワー》（《完成了历史使命的赖肖尔》），[美]赖肖尔：《ライシャワー大使日録》（《赖肖尔大使日录》），入江昭监修，东京：讲谈社 1995 年版，第 304～314 页。

② Akira Iriye, “Reischauer, Edwin Oldfather”, in John A. Garraty, Mark C. Carnes ed.,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Vol. 18, pp. 327～328.

③ Nathaniel Thayer,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1945–1972”, in Akira Iriye and Robert A. Wampler ed., *Partner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951–2001*, Tokyo; New York; London: Kodansha International, 2001, pp. 62～77.

④ 关于日本现代化论在越战后期所遭受的冲击，将在第七章中作详细的介绍。



加黯然失色,其代表人物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对“东方学”的批判中,揭露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sup>①</sup>。萨义德笔下的“东方”虽然只限于阿拉伯世界,没有涉及东亚,但他却为重塑东西方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石。在后殖民理论家的话语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正面评价,取而代之的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此后兴起的各种后现代思潮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比起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现代化论来,今天的人们显然更加偏爱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与此相对应,赖肖尔曾竭力主张并付诸实践的思想交流或者说“对话”外交,也自然地属于那种企图向非西方世界输出西方价值观的陈腐思想,赖肖尔式的文化说服至少从这一点上看是不受欢迎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美国的新一代学者对研究赖肖尔没有产生兴趣也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似乎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威胁”,而苏联的衰落也使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对日共识发生了动摇,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现代化论关于日本和欧美之间同质性的论点。于是,强调日本在本质上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日本异质论”应运而生,并对美国公众和政府在日本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直接反映到9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中<sup>②</sup>。这种新的日本观的兴起也部分地解释了赖肖尔的理论不再像以前那样受重视的原因。

总之,美国学术界至今没有对赖肖尔作过客观的、系统的学术研究。这也许是因为支持和反对赖肖尔的双方都是带着某种政治倾向去看待赖肖尔其人其事的。对赞扬的一方来说,赖肖尔的价值显而易见,他的著作和自传本身就是理解美日关系的最好教材,似乎不必再画蛇添足地去加以分析;对批评的一方来说,赖肖尔的学说在出发点上就是错误的,所以只能成为批判的对象,不值得花力气去研究。双方的立场也许都有道理,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他们对赖肖尔的评价都有失偏颇,前者只强调文化融合、政治合作的一面;后者只强调文化冲突、政治斗争的一面。因此,我们

---

① 参见[美]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 关于“日本异质论”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参见于铁军:《观念与实力: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第57~69页。

有必要以客观的、学术的态度重新审视赖肖尔,将他的思想和言行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以便对这个人物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进而加深我们对冷战时期美国与东亚关系的理解。

在日本,对赖肖尔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一方面,这位善于理解日本人心理的“知日派”大使无疑为美日关系留下了一段佳话,不管是政治家、学者还是一般民众,都对赖肖尔怀有真切的好感,这反而让溢美之词代替了客观的研究。也许对很多日本人来说,赖肖尔在“感情”上的立场要比他在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立场重要得多。另一方面,对赖肖尔的评价又不可避免地 and 人们对美日关系的看法联系到一起,支持美日同盟的人往往颂扬赖肖尔的功绩,反对美日同盟的人则揭露其外交的政治实质,这样,对赖肖尔的评述就存在着政治性大于学术性的倾向。例如,国际关系学者村田晃嗣在发表于《外交论坛》杂志的文章中,将赖肖尔描绘成一个挚爱日本的“知日派”大使,认为其外交充分体现了肯尼迪政府的政治风格<sup>①</sup>。而另一位名叫菅原和子的学者则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对赖肖尔提倡的“美日平等伙伴关系”论进行了剖析。她的研究虽然史料翔实,但专注于对美日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分析,把赖肖尔的思想言论简单地视为对美国军事政策的粉饰,所以既没能突出赖肖尔作为“学者大使”的特色,也忽视了赖肖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传统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sup>②</sup>。

不过,日本确也存在有关赖肖尔外交的较为客观的学术研究。外交史学家池井优曾对赖肖尔的大使任期作过详细的调查,还采访过赖肖尔本人。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中,从赖肖尔出任大使的时代背景、大使任命的政治过程、赖肖尔的个人背景、大使馆的组织人事以及赖肖尔对美日之间具体问题的处理等方面探讨了赖肖尔所扮演的大使角色,并由此揭示出60年代上半期的美国对日政策。在池井教授看来,赖肖尔的“对话”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日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理解上的不足,从

① [日]村田晃嗣:《アメリカ知日派の系譜③一九六〇年代:ライシャワーからジョンソンへ》(《美国知日派的系谱之三 1960年代:从赖肖尔到约翰逊》),[日]《外交论坛》,2001年6月,第87~91页。

② [日]菅原和子:《ライシャワーの“日米イコー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論の論理と実際》(《赖肖尔的“美日平等伙伴关系”论的逻辑和现实》),[日]《法学新报》,2002年第4期,第307~333页。



而为美国的亚洲外交开创了宝贵的先例<sup>①</sup>。他后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战后历任美国驻日大使,并出版了《驻日美国大使》一书,其中关于赖肖尔的一章又增添了新的材料和内容,叙述也更为精彩<sup>②</sup>。池井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见,但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美日关系的政策层面,对赖肖尔外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赖肖尔在日本论坛上挑起的“现代化论争”则少有论及。而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一点正是赖肖尔不同于一般大使的最重要特征,也是揭示日本现代化论作为一种思想如何作用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关键。因此,对赖肖尔外交的这一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在中国学术界,只有从历史学或日本学的角度对赖肖尔的日本现代化论所作的简单介绍,关于他的外交则几乎没有涉及<sup>③</sup>。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赖肖尔的研究仅仅限于零星的论文和美日关系史中的简单介绍,尚不存在对赖肖尔的思想和职业生涯的系统研究,特别是缺乏对他的学术思想和外交活动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分析;而且,研究赖肖尔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保存在哈佛大学档案馆中的《赖肖尔文件》(*Papers of 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也还没有被系统地利用过。

因此,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搜集和整理尚未被使用过的第一手资料,对赖肖尔这个人物和他生活的时代作全面系统的分析,以填补美日关系史上的一段空白;同时,突破传统外交史研究的局限,将对赖肖尔外交的研究从政策层面深入到思想层面,以此开辟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利用《赖肖尔文件》中的原始记录,结合当时日本和美国的报刊杂志资料,叙述和分析赖肖尔如何成长为一名学者和外交官,并在美日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过程。

构成本书基本脉络的是三条相互关联的线索。一是美国对东亚政策

---

① [日]池井优:《アメリカの対日政策——ライシャワー大使の役割を中心として》(《美国的对日政策——以赖肖尔大使的作用为中心》),[日]《法学研究》,1970年7月,第54~87页。

② [日]池井优:《駐日アメリカ大使》(《驻日美国大使》),东京:文艺春秋2001年版,第71~99页。

③ 沈仁安、李玉:《20年来日本历史学发展变化概述》,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国外史学动态》,1979年11月,第1~17页;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34~36页;诸葛蔚东:《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36页。

的演变；二是赖肖尔本人的学者生涯和外交官生涯；三是从赖肖尔的思想中反映出的美国对日本乃至东亚的基本看法。作者的意图是通过对这三条线索的交错叙述，把政治史、人物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并从史料中揭示出观点。当然，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只能算是一种尝试。

本书的第一章将追溯赖肖尔成长为一名日本学学者的人生历程，以图展现 20 世纪上半叶美日关系演变的思想背景，探寻美国人日本观的起源。

赖肖尔出生于东京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他人生最初的 16 年光阴，基本上都是在日本度过的。这样的家庭背景使赖肖尔自然地成为二战后美国日本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因为直到二战爆发，美国的日本学学者还是凤毛麟角，而像赖肖尔这样对日本有着直接体验的美国人属极少数。实际上，二战前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日本问题专家，几乎都有传教士的家庭背景，他们是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在美国建立日本学的使命。

赖肖尔在完成高中学业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国。他步哥哥的后尘，先后进入奥伯林大学(Oberlin College)和哈佛大学深造，而且和哥哥一样也选择了东亚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然而，在当时的美国，东亚学尚处于草创期，即便是哈佛也难以以为赖肖尔提供适当的学习条件。这种不利的环境却反而让他获得了游历欧亚的机会，在哈佛学习的第二年，赖肖尔遇上了他的授业恩师叶理绥，这位来自巴黎的汉学家对赖肖尔寄予厚望，很快地将他送往法国接受欧洲汉学的熏陶。从此，赖肖尔开始了他长达 5 年的留学生涯。他先是游学法、德、荷、比、意、英、奥、匈、捷等欧洲诸国，继而横跨西伯利亚重返日本，先后求学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专攻日本和中国的古代史，最后又辗转朝鲜和中国。当他回到哈佛时，一条通往东亚研究处女地的道路已经俨然呈现在这位年轻学者的面前。

然而，战争改变了赖肖尔的人生，也改变了美国的东亚学。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赖肖尔就被美国国务院远东司聘为高级研究员，还在哈佛为军队开设了日语课程。战争爆发后，他受陆军之托，在华盛顿建立了一所培训军官的日语学校。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大批学生，将在战后构成美国日本研究的中坚。战争期间，赖肖尔作为一名少校军官供职于陆军的情报部门，专门研究截获的日军情报。这时的赖肖尔尽管还人微言轻，



却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不少政策备忘录,从对日心理战的战略战术,到改革日本天皇制的构想,一个青年学者的爱国热情跃然纸上。战争结束时,他回到国务院,参与制定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

美国的东亚学在战后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重返哈佛的赖肖尔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一道,为东亚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赖肖尔本人不仅在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而且先后出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以及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系主任,几乎登上了事业的巅峰。然而,历史的狂澜却终将这位学者推向了国际政治的潮头浪尖,赖肖尔似乎注定要走出象牙塔去完成他那传教士般的使命。当美日关系在1960年因“安保斗争”而濒临绝境时,赖肖尔受命于危难之际,再次来到他挚爱的国度日本。这一回他却是作为肯尼迪新政府的驻日大使,他肩负的任务是去弥合美日之间的思想裂痕。

作为一名“学者大使”,赖肖尔是带着一套完整的理论武器奔赴外交前沿的。本书的第二章将系统地介绍赖肖尔的这套理论武器——日本现代化论。冷战使日本从一个亟待改造的敌人一变而为一个需要扶植的盟友,也使美国的日本研究经历了理论范式的转变,强调战前日本的封建军事性的旧范式,被强调日本现代化的成功经验的新范式所取代。赖肖尔作为这一新范式的旗手,引领着美国的日本研究走进了现代化的视野。在他看来,日本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含义,其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美国向世界传播自由主义的成败。因此,美日两国与其说是军事上的盟友,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盟友。

赖肖尔不仅赋予日本研究以强烈的冷战色彩,而且直接参与到美国的外交政策讨论中。他激烈批评美国的亚洲政策过于倚重军事同盟体系,提出比起军事和经济手段来,意识形态是赢得亚洲冷战的更有效武器。“思想的战争”<sup>①</sup>成为赖肖尔亚洲政策构想中的核心概念,他甚至为美国在亚洲的意识形态斗争设计了一系列具体方案,包括促进与亚洲的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以及学生的交流,发挥美国学者传播现代知识的功能等,总之,要

---

<sup>①</sup> “思想的战争”这一用语在本书的语境中有特殊的含义。赖肖尔认为,亚洲的冷战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并用“思想的战争”来概括自己的亚洲政策构想。在赖肖尔的著述中,“思想的战争”与意识形态斗争基本上是混用的,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本书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一用语。

让美国的理想和价值观在亚洲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在制造和传播冷战知识方面,赖肖尔绝不是单枪匹马。实际上,在当时的美国,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正主导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并通过肯尼迪政府任用的大批学术精英直接塑造了美国的对外政策。这套理论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日本研究,以“近代日本研究会议”为标志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不仅确立了现代化理论在日本研究领域的主流地位,而且把这一理论引入了日本学术界。这一切似乎都在为赖肖尔出任美国驻日大使搭建舞台。

本书的第三章将具体探讨赖肖尔出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背景和过程。1960年,为反对美日新安保条约以及强行推动该条约在国会通过的岸信介政权,日本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场战后日本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令美国人备受震惊,他们没料到日本国内的反美力量会如此强大,华盛顿一片哗然,不知所措。包括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二世在内的许多美国高官沿用僵硬的冷战逻辑,把这场运动看成是日本国内外共产主义势力阴谋策动的结果,但政界和舆论界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赖肖尔便是其代表之一。他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指出,发生在东京的整个事件暴露了“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反对派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主张迅速建立起美国与日本反对派各势力之间的“对话”<sup>①</sup>。赖肖尔的这一“对话”战略源于他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一贯主张,而肯尼迪的上台终于使他有了用武之地。1961年3月,赖肖尔被正式任命为新一任美国驻日大使,他决心用肯尼迪的“新边疆”精神去感化大洋彼岸的日本人。

赖肖尔上任伊始,就改组大使馆的机构,新设文化公使一职,以加强美日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他还调兵遣将,延揽了一批精通日语、熟悉日本文化的专家,将整个大使馆变成了与来访的日本各界人士自由交谈的场所。

本书的第四章将讨论赖肖尔“对话”外交的具体策略。为了构筑“对话”的舞台,赖肖尔积极地与日本媒体展开深层次的接触,以此建立良好的

---

<sup>①</sup> Edwin O. Reischauer, “The Broken Dialogue with Japan”, *Foreign Affairs*, Vol. 39, No. 1, Oct. 1960, pp. 11 ~ 26.



公众形象。他还遍访日本各都道府县,将“对话”的精神撒播到乡里民间。与反对党和工会的接触是赖肖尔“对话”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刚刚在东京安顿下来,就开始了与社会党、民社党和各大工会团体领导人的会谈。会谈双方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赖肖尔坦诚相见的精神却赢得了日本人的信赖。不管是和他政见相近的民社党和社会党右派,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和他尖锐对立的社会党左派以及激进的工会团体“总评”,都乐意派代表前往大使馆与赖肖尔交谈、递交请愿,甚至抗议;而赖肖尔则不论这些人在大使馆外如何高呼反美口号,或在报纸上如何猛烈抨击他,都始终以“低姿态”坚持和他们的接触。他还竭力促成美日两国工会团体之间的交流,将大批日本的工会代表请到美国作实地考察。与此同时,赖肖尔利用自己的学者身份,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广交朋友,还频频访问日本各大学,与教授和学生展开交流。此外,他还安排许多访日的美国要人和日本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见面,以壮大“对话”外交的声势。他在这方面的一大杰作是导演了美国司法部长、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的访日,成功地在日本舆论界刮起了一阵肯尼迪旋风。

如果说以上各项举措主要是创造了一种气氛、一种风格,那么,赖肖尔和日本知识分子之间的“现代化论争”则深入到了美日关系的思想层面。赖肖尔出任大使期间,在日本的各大报刊杂志上频频撰文立说,重新评价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历史,赞扬日本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效法日本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新的历史观在日本思想界、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毁誉齐至。本书的第五章就将着重讨论这场“现代化论争”的内容和意义。